

#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主 编

赵 林 森

副主编

马思军 姚玉田 李太阳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赵林森 / 主 编

马思军 姚玉田 李太阳 / 副主编

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

|     |     |     |     |
|-----|-----|-----|-----|
| 王耀东 | 王建丽 | 卢玉馆 | 刘国梁 |
| 刘月林 | 张爱青 | 张国平 | 张建明 |
| 李青达 | 杨太生 | 高国俊 | 曹振华 |
|     |     |     | 刘志刚 |

(晋)新登字 8 号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主编 赵林森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南内环街 31 号)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大 32K 印张:13.375 字数:322056 字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81032-189-7

D·17 定价:7.50 元

## 序 言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东欧剧变、曲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在暂时的低潮，然而，中国共产党却毫不动摇地继续高举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旗帜，率领着五千万共产党员和十一亿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并取得了举世公认，鼓舞人心的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创建以来，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有曲折有失误，也有严重错误和教训。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依靠着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偏差，改正了错误，医治了创伤，拨正了航向，从而使党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沿着正确的方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正因为如此，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护，而且也博得了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主持公道的人们的称赞和惊服。于是，认真研究中共党史，探索中共成功奥秘的人士愈来愈多。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和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艰巨的任务，也深深认识到学习党史、研究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坚定信念，增强信心，发扬成绩，吸取教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开拓进取，敢“闯”敢“冒”，抓住机遇，加快步伐，发展自己，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当这时，《中共党史专题研究》一书问世了。它既是为广大读者“雪里送炭”，也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一周年的献礼。

本书以详实的史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细致地研究

了中国共产党每个历史时期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真实面目和经验教训，阐明了它的必然性、历史作用、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有些专题和段落，读后使人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

这本书的编写注重了史论的有机结合。既不是纯史的记叙，又不是纯理论的论述，而是把史实与理论融为一体，论从史出，史为论据。一些一度被歪曲了的历史，通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对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观点和历史结论，都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实事求是的科学阐述得以体现和验证。只要阅读过这本书，就会大受启迪，或悟出其中深刻道理，或得出恰当的结论。读后不仅能够丰富知识，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理解，而且对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大潮中去也是大有裨益的。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本党史专题研究的专著，无论是史实的记叙，理论的阐述，文章的结构，文字语汇的运用等方面，都有需要进一步加工和推敲之处。经过读者的指正，相信再版时会修改得更好。

郑社奎

1992年4月17日

#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 目 录

|    |                                 |       |
|----|---------------------------------|-------|
| 一  |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 (1)   |
| 二  | 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 (16)  |
| 三  | 第一次历史性转变·····                   | (37)  |
| 四  | 第二次历史性转变·····                   | (77)  |
| 五  |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            | (99)  |
| 六  |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 (119) |
| 七  | 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                  | (138) |
| 八  |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斗争·····              | (159) |
| 九  |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 (181) |
| 十  |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              | (203) |
| 十一 | 关于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br>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 | (222) |
| 十二 | 建国初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三次批判运动·····         | (249) |
| 十三 | 关于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问题·····        | (273) |
| 十四 |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问题·····                 | (289) |
| 十五 | 正确评价十年建设时期的成就·····              | (307) |
| 十六 |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是怎样<br>误解彭德怀的意见的·····  | (321) |

|     |                          |       |
|-----|--------------------------|-------|
| 十七  | “文化大革命”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 | (339) |
| 十八  |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覆灭·····  | (362) |
| 十九  | 第三次历史性转变·····            | (402) |
| 后 记 | ·····                    | (420)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是历史的必然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产生得太早了，等到中国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后再产生也不迟。

持这种观点的人，至少是不懂得中国和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状况，以及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中国共产党不产生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也不等到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再产生，偏偏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是有其原因的。

**（一）中国共产党是应亿万劳苦大众的呼唤和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促使中国封建经济解体，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以便摆脱本国的经济危机，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为此，它们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和摧残，竭力扶植中国的封建经济。致使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所有制及地主对农民的



残酷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和买办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占了显著的优势。不到农村人口 10% 的地主、富农，却占有 70~80% 的耕地，而且多是优等地，贫雇农和中农虽占农村人口的 90% 以上，却只占全部耕地的 20~30%，大多是劣等地。地主、买办官僚头子们占的耕地更多。例如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占有肥沃耕地 400 顷左右，张作霖在东北圈占耕地 15 万垧（1 垧等于 10 亩）；闫锡山在五台山附近占有价值达 600 万元的耕地。中等以下的官僚、政客、绅士也占有大量耕地。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存，不得不遭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地租的内容分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两种。形式有定租制和分租制两种。如是定租制，不管丰年欠年，都必须按原定的数量交租。交不起，就拿别的家产或人或劳力抵租，抑或记在帐上，与高利贷结合起来，加上利息于来年交租。如是分租制，就按比例分享一年的收获物。往往是不劳动的地主拿大头，劳动的农民拿小头。除收地租外，地主还兼放高利贷。高利贷也分粮与款两种。如借粮，便是借旧粮还新粮；借粗粮还细粮；借一石还石五或石八，甚至还两石。借款，有现扣利和年终利两种。现扣利也叫出门利，即是借款的当时就扣利。如“大扣一”（借一元等于一元一）、“八扣二”（借一元只给你八角）等。年终利即是年终还款时一并交付利息。借款一般不过年，如年终还不起，就利上加利来年再还，叫作“黑驴打滚利滚利”。穷人借上债还不了，确是如牛负重，越走越重，最后压得爬在地下，永远起不来。此外，农民还给地主做各种无偿的劳役，向地主缴纳各种贡品。有的地主还兼有雇工剥削。富农主要靠雇工剥削，有的也兼少量地租和高利贷剥削。雇农起鸡叫睡半夜，受的苦很重，挣的工资却很少，往往连家口也养活不了，父母、妻子还得另谋生路，或给财主家放牧牲畜、或帮厨、或打短工等。买办商人替帝国主义在农村推销商品，收购农产品，进行

不等价交换，残酷剥削农民。农民遭受几重剥削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资本家，特别是官僚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对工人的经济剥削也很残酷。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在 12 个小时以上，有时达 18 小时之多。大多数工厂不过星期日。工人的工资极低，每日只挣二、三角钱，有的女工和童工，每月只挣一元以下的工资。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很恶劣，不少工矿企业设备陈旧而又落后，经常发生事故。特别是采矿业，工人的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如抚顺煤矿，1931 年发生事故 300 起，死亡工人 3814 人，约占全矿工人的半数。

在政治上，国家丧失了一切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丧失了任何自由和权利。“三大敌人”为所欲为；劳苦大众，任其蹂躏。特别是帝国主义，疯狂野蛮，世所罕见，奸淫烧杀，惨绝人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血洗天津和北京，便是典型例证。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内中西合璧的各种高技术建筑物 200 多座，内有不少无价珍宝和文物典籍，被劫掠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 600 万镑。八国联军血洗天津和北京，使这两座城市尸积如山。北京庄王府被烧时，当场活活烧死 1700 多人。英军在天津抢劫的银子可堆成一座 30 英尺高，30 英尺宽的银山。在北京，仅法国传教士樊国梁从户部尚书立山家里一次就抢走价值达 100 万两白银的财物。颐和园内“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珍奇，扫地遂尽”，所抢各处库款“约计 6000 万两”白银。在八国联军血洗天津的同时，沙俄侵略军在东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共杀死 15 000 余人。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抵抗不住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和人家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甚至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也和人家签订不平等条约。例如：1885 年在中越抗法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情况下，清政府竟下令停战议和签订了《中法新约》，同意法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并修筑铁路等。从 1842 年签订《南京条约》到 1949 年全国大陆解放前，加上国

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共计1182个。从《南京条约》到1901年辛丑条约之间，共赔侵略者13亿两白银。1840年至1915年的70多年间，英国人在中国贩卖鸦片，汇回本国的利润就达100万两白银。既刮去了中国人民的血汗，又毒害了中国人。帝国主义割去的国土（包括租界和租界地）也不少，其中，光沙俄割去151万多平方公里，差不多有一个新疆或十个山西那么大。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要由外国领事裁判，中国法庭不能过问。至于中国人与中国人打官司，也是“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因此，遍地是冤狱，处处有不平。

劳苦大众不甘心忍受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各种方式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抗和斗争。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地进行血腥镇压。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各帝国主义又分别扶植各自的军阀势力，进行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更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因为战争不仅直接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加重了赋税。仅北京政府1918年的军事预算就达2.03亿元，比清王朝统治时期军费预算最高的1910年增加了一倍。军阀政府为了弥补其庞大的军费支出，就巧立名目，增加税收。捐税名目五花八门，诸如人口税、烟酒税、盐税、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割头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甚至连农民进城掏大粪也要税。当时有人写打油诗讽刺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费用摊派，如慰劳费、过节费、招待费、军鞋费等等。军阀政府还要征兵、征粮、拉夫、甚至公开抢掠。豪绅恶霸、地痞流氓、汉奸特务等，还要想方设法搜刮民财，敲诈勒索。加之旱、涝、雹、虫、冻、风、瘟等灾害，此起彼伏连年不断（如1913年河北水灾达十个月之久，共有103县1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被淹），致使劳苦大众衣不遮体，食不饱肚，吃糠咽菜也难以活命。

总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象三座大山一样压

在中国人民身上，使人民大众陷入苦难的深渊，中华民族处于灭亡的边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但是，每次反抗都遭到了残酷镇压，每次起义终归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可谓声势浩荡，斗争激烈，并建立了持续14年之久的全国政权，但也难免失败的下场。甚至连近代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尚未成功。正如毛泽东所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农民、小资产阶级，虽然受剥削压迫惨重，反抗性比较强，但是，由于他们受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缺乏组织纪律性，缺乏科学知识，找不到先进的思想武器，提不出走向胜利的革命纲领，只能用宗教的组织形式和空想的绝对平均主义作思想武器。在斗争过程中，他们一方面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崇拜封建的皇权思想和等级观念，试图建立新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们不但不能团结一致地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就连过去农民战争那种改朝换代也难以做到。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提出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是，由于这个阶级经济力量薄弱，与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还有或多或少的经济联系，又处于剥削阶级的地位，因而，在政治上就表现得十分软弱，动摇，容易妥协，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始终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来，不能发动、团结领导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

在悲惨的绝望中，中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其政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联合农民等革命力量一

举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也应当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劳苦大众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夺取革命的胜利。随着十月革命精神和马列主义的深入宣传，越来越多的人明确了这个真理，他们急切地希望这样的政党的诞生，大声地呼唤着这样的政党的到来。

因此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黑暗的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应亿万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呼唤和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

## （二）中国共产党是顺应世界革命潮流而产生的

二十世纪初，世界早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早已瓜分完了殖民地，而且又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进行了一场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不仅加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灾难，而且也给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不幸。因此，不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劳苦大众起来反抗殖民主义者，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而且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团结与领导一切被压迫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共同的敌人把这两股革命势力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汇成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世界革命潮流。

在这种革命斗争中，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相继产生了。这种政党一产生，革命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尤其是在人民受剥削最残，受压迫最重的国家，革命就爆发得早、势头也更大。

沙俄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也是劳苦大众受剥削最残、受压迫最重的封建军事帝国。在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在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思想指导下，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鼓舞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

又相继产生，并立即肩负起领导本国无产阶级革命或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任，促使世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高涨起来。

世界革命的洪流鼓舞了中国人民，推动着中国革命迅猛发展。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性的局限和面临的敌人过于强大，都难以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而中国无产阶级是与现代最先进的大生产相联系的最先进的阶级。这个阶级受压迫最重，反抗性最强；分布比较集中，便于组织发动革命运动；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它大公无私，有彻底的革命性，富有牺牲精神，最容易接受马列主义这种最先进、最科学的革命理论。而马列主义一旦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会产生，并立即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

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一旦领导了中国民主革命，革命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了，它已成了走向社会主义，最终到达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不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将越过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阶段，沿着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向前发展，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所追求并为之浴血奋斗的理想社会。

再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帝国主义列强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又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因此，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帝国主义不容许，而且社会主义也不允许。由此可见，中国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只能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

### (三)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虽然很有必要产生,但是能否产生,还要看当时是否具备起码的条件:一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和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二是要有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使它与工人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无近代工业,只有手工作坊和工厂手工业。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近代工业开始在中国出现,但直至1860年,中国尚无自己的近代工业,只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香港、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办了少数规模不大的近代工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近代工业才开始出现。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大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培植自己的势力,依赖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安庆、福州、南京、天津等地创办了一些近代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主要制造枪炮、弹药、修造船舶等。从七十年代起,洋务派开始创办民用性质的近代企业。这些企业除少数官办外,大多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大多是轻纺工业。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有一些纯属商办的企业,而且有了五金、机器修造等工厂。六十年代至1890年中日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无视中国主权,强行在中国开设了一些近代工业企业。1894年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由于获得了在中国设厂的特权,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外国投资的工厂企业大有增加。从1895年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18年当中,帝国主义在华所设的投资在10万元以上的工矿共约136家。

随着外国资本家开始在中国开设工厂,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的50多年间,产业工人的数目约有10万左右。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已达16万左右,加上海员、铁路工人等已有100多万人。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迅速发展壮大。到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左右。

中国的产业工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它不仅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而且有自己的独特优点，因而使中国工人阶级成为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进行着反剥削和反压迫的斗争。在长期的激烈斗争中，他们的觉悟逐步提高，由单纯为经济而斗争发展到既为经济又为政治而斗争。1919年由“五四”运动发展为“六五”工人大罢工，便是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开始，他们已由整个阶级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一重大转变，是与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的，是用马列主义指导工人运动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不仅要以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阶级基础，而且要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其思想基础。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工人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就不能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运动，党也不成其为先锋队。因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否则，工人运动就会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走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道路。因此，从外面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备条件，而承担这个任务的则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前，已有人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但由于是零星的、片断的、又无其实践作验证，社会影响不大，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被压迫人民看到了具体的出路，看到了中国新时代的曙光，从而也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注重了系统学习和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其代表人物就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



等。

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列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李大钊。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指出了当时的形势和未来的光明前景，也表达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的心声。“五四”运动前夜，陈独秀也发表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他们的论文，表明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他们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革命问题，要求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就表明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始结合，预示着共产党即将诞生，新的革命运动必然到来。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也促进了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进而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五四”运动虽然还没有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许多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却成了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

通过“五四”运动和“六五”工人运动，使得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李达、恽代英、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也认识到了急需用马列主义去武装工人，指导工人运动。于是，他们积极地投身到工人中间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使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通过办刊物、写文章、办学校、组织革